

# 思想史

余英時題 

Intellectual History

專號：五四新文化運動

王汎森

王 銳

汪榮祖

潘光哲

瞿 駿

Sebastian Veg

Shakhar Rahav

6

# 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專號：五四新文化運動

---

6

2016年3月

## 思想史第6期編輯委員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Miaw-fen L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沙培德	康乃狄克大學歷史學系
Peter Zarr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陳正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Jeng-guo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黃克武 (主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Ko-wu Hua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蕭高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Carl K. Y. Sha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 編輯顧問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	David Armitage	Harvard University
余英時	普林斯頓大學	Peter K. Bol	Harvard University
村田雄二郎	東京大學	Benjamin El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林毓生	威斯康辛大學	Knud Haakonssen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張灝	香港科技大學	Jonathan Israe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inceton
陳弱水	國立臺灣大學	Nicholas Phillips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		
葛兆光	復旦大學		
羅志田	四川大學/北京大學		

(依姓名筆劃排序)

# 目錄

## 【論著】

- 潘光哲 怎樣歡迎「賽先生」：胡適與巴斯德……………1
- 瞿 駿 新文化運動的「下行」  
——以江浙地方讀書人的反應為中心……………47
- 王 銳 章太炎晚年對「修己治人」之學的闡釋……………99
- Sebastian Veg (張穎) Lu Xun and Zhang Binglin: New Culture,  
Conservatism and Local Tradition …………… 151
- Shakhar Rahav Picturing Revolution: Visual Commemorations Of  
China's May Fourth Movement …………… 195

## 【研究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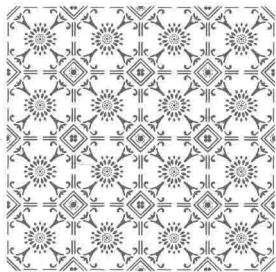
- 王汎森 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239

## 【書評】

- 汪榮祖 走向威權之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書後……………251

【論著】

## 怎樣歡迎「賽先生」：胡適與巴斯德\*



潘光哲

筆名彭廣澤、勞棟，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任胡適紀念館主任。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臺灣史。著有《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等專書及學術論文七十餘篇，並主編《（新版）殷海光全集》、《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等史料彙編；並另主編《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紀念胡適先生一二〇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外交：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等書。

## 怎樣歡迎「賽先生」：胡適與巴斯德<sup>\*</sup>

### 摘要

「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向為吾人詮解《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主題。只是，科學在中國得以生根發芽，乃至花開滿園，實非朝夕之功。中國對於「賽先生」的認識，如欲「堂堂溪水出前村」，往往有賴於大量的論說宣傳。本文以胡適對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的闡釋為中心，疏理胡適彰顯表揚巴斯德的思想脈絡，並論說闡釋胡適藉巴斯德以鼓動科學的用心，固然寄託國族前景能夠別展新局的理想期盼，卻也與他執著於如何在中國涵育落實「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信念，密不可分。藉胡適對巴斯德的闡釋為例，當可想見，「賽先生」在中國的歷史命運，從來就不是以科學自身的運作邏輯為動力，總是難逃於具體的社會文化環境之網羅。

**關鍵詞：**胡適、巴斯德、科學

<sup>\*</sup>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知識人群體》（計畫編號：MOST-103-2410-H-001-040-MY2）補助成果之一；本文初稿發表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等主辦，「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學術研討會」，2015年5月30日；陸續承蒙丘成桐、王汎森、黃克武、沙培德、蕭高彥、雷祥麟、苑舉正、張谷銘、朱瑪瓏、鄒新明、金富軍、岑丞丕與鄭鳳凰諸方學界前輩友朋，糾謬攻錯，提供資料；本刊審查人提出之意見，尤其惠我良多，謹此特致謝悃。一切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一、

1925年5月，胡適（1891-1962）與江冬秀（1890-1975）的第二個愛情結晶女兒素菲，不幸夭折。<sup>1</sup>失去了6歲稚齡的掌上明珠，對胡適的打擊實在不小，他卻好似竭力隱藏一番傷心。壓抑強忍，實非易易。在那年年底，當胡適讀到述說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生命史的《巴斯德傳》（*The Life of Pasteur*），<sup>2</sup>感情終於被挑動起來，他寫信告訴夫人，讀這部書的時候，「忽然掉了不少的淚，手絹都濕了」。<sup>3</sup>近30年後，胡適得悉友人陳之邁（1909-1978）夫人身罹惡疾，致函慰問，又回想起當年的激動，說自己當年讀這部書「曾幾次掉淚」，連帶評價正因為有巴斯德的「奮鬥成功」，因此可以「有效的控制傳染病」。<sup>4</sup>顯然，這部書描述巴斯德如何救助生命，增加

- 1 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頁304。
- 2 René Vallery-Radot, *The Life of Pasteur*, translated by Mrs. R. L. Devonshir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ir William Osle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3)；原著執筆者華里－藍道（René Vallery-Radot, 1853-1933）是巴斯德的女婿，美國化學史家Aaron J. Ihde（1909-2000）嘗稱譽曰，在各種篇幅不一的巴斯德傳記裡，是書為最佳著作之一，見：Aaron J. Ihd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emist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 791.
- 3 胡適，〈致江冬秀〉（1927年3月5日），收入陸發春編，《胡適家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頁119-121；胡適講，毛坤、李競何記，〈學術救國〉（1926年7月於北大學術研究會演講），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冊20（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42（原件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HS-JDSHSC-0220-005）。
- 4 胡適，〈致陳之邁〉（1953年8月8日），收入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冊6，頁2345-2346、《胡適全集》，冊25，頁534-535；原稿稱：「我在這二十年前讀英譯本Valery-Radot的Pasteur傳記」一語，應為胡適誤記。

人類福祉的貢獻，在在讓胡適傷情感懷不已。

可是，自稱「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the incurable optimist)<sup>5</sup>的胡適，從來不會陷溺在「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心緒裡而不可自拔。大哭一場之後，胡適「願把金針度與人」，要將自己閱讀這部書得著的啓發，昭告世眾。追尋科學，頂禮崇拜科學，乃至形構為「科學主義」的教條，本來就是廿世紀華人知識群體基於打造鍛鍊民族國家的情懷而願共同謳歌吟詠的永恆旋律之一，<sup>6</sup>在這闕雄偉的合唱曲裡，巴斯德是從來不會缺漏的音符，胡適則好似唱頌巴斯德的合唱隊伍裡最受人矚目的明星級歌手。就胡適個人想望科學的思想歷程著眼，他對巴斯德的吟唱闡述，猶如持續不斷的「固定樂思」(the *idée fixe*)，<sup>7</sup>縱然稍有變調，卻是前後貫穿，總要將來自異域他邦的巴斯

5 胡適回憶，丁文江(1887-1936)便是如此稱呼他的；蔣碩傑亦謂一些外國記者也這樣稱呼他，參見：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10，頁3427；冊6，頁2053-2054。胡適也自稱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胡適，〈東亞的命運〉，《自由中國》，8：1(臺北，1953年1月1日)，頁4。

6 相關研究，不可勝數，如：D. W. Y. Kwok(郭穎頤)，*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e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楊國榮，《科學的形上之維：中國近代科學主義的形成與衍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朱華，《近代中國科學救國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餘例不詳舉。

7 “the *idée fixe*”一辭，借用自法國作曲家Hector Berlioz(1803-1869)表現在《幻想交響曲》(*Symphonie fantastique*, op. 14)裡的譜曲創見，意指貫穿全曲的每一樂章的基本曲調(melody)，雖然，「固定樂思」在各個樂章裡是以不同樂器演奏的，曲式也各不相同，甚至也有變奏樣式，它卻總是不斷地重現，產生了統一全曲的作用，在西洋音樂史上影響深遠，如Richard Wagner的歌劇裡廣泛採用的「動機」(leitmotifs)，便是師法其意的結果，參見：邵義強，《交響曲淺釋》(臺北：全音樂譜出版社，1988)，頁141-146、Hector Berlioz, “Programme”, in *idem.*, *Symphonie fantastique*, conducted by Varujian Kojian (San Francisco, CA: Reference Recordings, RR-

德，營構形塑為「科學英雄」(the hero of science)，進而轉化利用，強調如何假巴斯德為典範，使得科學可以成為「公民認識論」(civic epistemology)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up>8</sup>好讓科學在中國得以生根發芽，乃至花開滿園。不過，胡適彰顯表揚巴斯德，鼓動科學的用心，固然寄託國族前景能夠別展新局的理想期盼，既與他自己的思想立場，密切相關；更也與他引徵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的話：「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sup>9</sup>並始終「津津樂道」，期可涵育落實「健全的個人主義」<sup>10</sup>的執著信念，密不可分。那麼，為了挽救

---

11CD)、Annette and Jeffrey Chesky, "Liner Notes", in Hector Berlioz, *Symphonie fantastique*, conducted by Massimo Freccia (New York: Chesky Records, CD88)。

<sup>8</sup> Sheila Jasanoff指出，她以「公民認識論」這個辭彙來表達那些在特定文化裡，基於政治和歷史而產生的公眾知識方式，並透過一套制度化的實踐，用以測試與布導那些將成為集體選擇的知識訴求(knowledge claims)，見：Sheila Jasanoff, *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9, 255。

<sup>9</sup> 胡適，〈易卜生主義〉(1918年5月16日作，1921年4月26日改定)，原刊：《新青年》，6：4(北京，1918年6月15日)，《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卷4，頁33。

<sup>10</sup> 胡適述說「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场景，與其思想前後變遷，密切相關，具體言之，他的〈易卜生主義〉已顯此意；爾後，胡適回顧1910年代末期引介「易卜生主義」之原因，在於「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種健全的個人主義」，其內容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說的：『你想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二是「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獨立評論》，150〔北平，1935年5月12日〕，頁1-4)；考究其實，正如江勇振指陳，胡適〈易卜生主義〉引徵易卜生之論說本源，實有依傍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者，可視為胡適留學美國時期懷持不爭主義、世界主義的觀念，彰顯個人主義思想巔峰之作；爾後胡適1920年1月上旬在唐山學術演講會發表〈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國族危亡，在華人的文化世界裡，科學固然佔有不證自明並且儼若至尊霸權的地位，世所公認。只是，科學的意義與價值，不該只侷限於為國族命運而服務的範疇。述說胡適和巴斯德的這段因緣，<sup>11</sup>應該可以對解釋華人知識群體為什麼熱情歡迎「賽先生」，提供另一面向的例證。

---

(《胡適文存》，卷4，頁173-189)，則已超越〈易卜生主義〉之藩籬，揭櫫點滴的改造，進行切實的調查等等深受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影響之綱領；而終胡適一生，則始終願宣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而不輟(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345-406)；至於其他相關研究大多未注意胡適「健全的個人主義」論說之變化與其依據，不足為取，如：張寶明，〈胡適「健全的個人主義」與「自由」的分野〉，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403-414(餘例不詳舉)。

- 11 關於科學(「賽先生」)在現代中國思想界的意義與價值，研究成果，繁多難盡，不一一詳舉，將隨文脈所涉，隨時指陳檢討；至如胡適對於巴斯德之詮釋，前行研究者，僅只江勇振指出，胡適將巴斯德視為足可闡釋讀書與救國的聯結人物，並簡單地表示，胡適讀過René Vallery-Radot的*The Life of Pasteur*(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422-427)；本文就中國思想界與胡適詮釋巴斯德之整體脈絡，進行研析；況且，胡適(與其他中國知識人)對巴斯德的詮釋，可視為「巴斯德式的神話」(the Pastorian myth)在舉世環宇之建構工程的組成部分，即如Gerald L. Geison指陳，巴斯德之名何以聲揚國際，自有待系統性的比較研究；只是，這闕「巴斯德式的神話」之傳唱，其實是錯綜複雜的歷史結果，實宜開展還諸歷史本身的探究工作，參考：Gerald L. Geison, *The Private Science of Louis Pasteu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64-267、pp. 272-273、pp. 277-278；本文師法其意，從歷史脈絡考察巴斯德在中國的接受史，指陳胡適對於巴斯德象徵意義的詮釋，多重繁富，復較為細密地比對胡適依據*The Life of Pasteur*開展立論之所在，應皆有所超越，自可補其不足；再，筆者嘗刊發一稿：潘光哲，〈胡適與巴斯德〉，《數理人文》，4(臺北，2015年4月)，頁92-101；是文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為通俗普及之作，非學術專業論著。

## 二、

對中國知識人群體而言，巴斯德並不是絕對陌生的名字。<sup>12</sup>至少早在1890年，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負責主要編務的《萬國公報》，就登出過由蘇格蘭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撰寫的巴斯德小傳。韋廉臣本來就是向中國讀書界介紹科學（當時稱爲「格致」之學）而不輟的傳教士，過去他編寫的《格物探原》（1876年初刊，三卷本），就頗引發大清帝國知識人的注意，銷行不輟，乃至流傳於日本；<sup>13</sup>此刻他則以巴斯德的科學發現爲例，闡明「格致家」爲什麼「大有裨于國家」的道理。在韋廉臣筆下的巴斯德，更是位「一生自幼恭敬上帝，以救主耶穌爲依歸」的人物，他還說自己曾親聞巴以「以耶穌爲坊表，善與人同，一以增人之學問，一以免人之苦楚也」的教誨。<sup>14</sup>說到底，韋廉臣介紹巴斯德的用心，還是藉之爲例來宣揚天主福音的。

對比之下，晚清時代介紹巴斯德的其他論者，用心所在，根本與宗教無關。如目前生平情況還莫知其詳的鄭鳳鈞，於1909年在《紹

---

<sup>12</sup> 朱瑪瓏指出，自1880年起，上海與香港等地的英文報紙，即時常報導巴斯德的相關事蹟，巴斯德並因此成爲科學家一詞的代表，見Marlon Zhu, "Microbes, Newspaper Media, and the Pasteurization of East Asian Ports," The 2015 AAS-in-Asia Conference, Taipei (2015.06.23)；筆者著眼所至，則是華人知識社群的情況。

<sup>13</sup> 《格物探原》另有日本出版的五卷本（1878年）與六卷本（1880年出版於中國），見：劉廣定，〈《格物探原》與韋廉臣的中文著作〉，收入劉廣定，《中國科學史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頁131-160。

<sup>14</sup> 韋廉臣，〈格致有益于國·一章·巴士德（上）〉、〈格致有益于國·二章·巴士德（下）〉，《萬國公報》，冊14、15（上海，1890年3月、4月），頁11a、6a-6b。

與醫藥學報》發表的〈巴斯德傳〉，就絕無宣教意懷，他強調「微生物學為現今醫界之大問題，而巴斯德為發明微生物之鼻祖」，因此特別介紹他的生平與貢獻，還說法國人「投票公定十九世紀之偉大人物，巴氏首選，拿破崙次之」，闡釋了他的歷史定位。<sup>15</sup>1908年6月面世的《紹興醫藥學報》，係由何廉臣（1861-1929）、裘吉生（1873-1947）等組織之紹興醫藥學報研究社創辦，被認為是近代最早的中醫期刊，是刊以「研究醫藥精理，發達神州，闡發神農聖學，保存天產利權」為宗旨，<sup>16</sup>它的讀者則評價這分刊物確可「發明舊學，闡揚國光」，<sup>17</sup>可以說實在是一分帶有文化民族主義的色彩刊物。出現在《紹興醫藥學報》的這篇〈巴斯德傳〉，引介其人其事，要旨雖與「聖學」、「國光」無關，正可顯示，借鑒「他山之石」，始終為建構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提供了無窮的動力。

正是透過不同的渠道，巴斯德的名諱與貢獻，在民國初期已展現共同基本認知。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社：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東方雜誌》，在中國讀書界首屈一指，廣受歡迎；<sup>18</sup>出現在其間的巴斯德，即如好似不證自明，讀者共知的人物。或是如孫祖烈（1854-

15 鄺鳳鈞，〈巴斯德傳〉，《紹興醫藥學報》，14（紹興，1909），頁17a-17b；按，鄺鳳鈞亦自言，「微生物學」即「微生物學」；當即“microbiology”（現行譯法亦為「微生物學」）。

16 劉德榮，《劉德榮醫學文集》（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8），頁225；華祝考，〈裘吉生的中醫編輯工作經驗研究〉，《中醫藥學報》，1988：3（哈爾濱，1988），頁38；傅維康，〈何廉臣生平述略〉，《上海中醫藥雜誌》，2008：6（上海，2008年6月），頁69-70。

17 引自：裘詩燧，〈我國早期中醫藥雜誌《紹興醫藥學報》簡介〉，《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1986：3（濟南，1986年6月），頁59。

18 相關研究，如：陶海洋，《現代文化的生長點：《東方雜誌》（1904-1948）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4）；餘不詳引。

1899) 述說巴斯德乃是「防疫之事，獨標新諦」的人物之一；<sup>19</sup>或是如吳敬恆（吳稚暉，1865-1953）述說科學發現，往往是學者「樂此不疲」的結果，巴斯德「好窺顯微鏡，以成黴菌學」，就是論證的依據之一；<sup>20</sup>乃至於不詳人氏從整體脈絡裡說巴斯德「發明微生物後，醫學乃大改良」，只是，不該高估他的貢獻，因為他的「新發明，亦僅如令吾人於昏夜之中，有天曉之希望，使吾人今日有滅害毒物之希望耳」。<sup>21</sup>爾後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之惲代英（1895-1931），青年時期起就是《東方雜誌》的愛讀者，並自1914年起開始投稿，數量繁多，<sup>22</sup>其中一篇講解「細菌致病說之由來」，起首便贊揚「微生物學」，乃是「法國科學家巴斯底氏所創」，而且他還「發明種痘術……應用此術以治瘋犬焉」。<sup>23</sup>「開卷有益」。《東方雜誌》的讀者，可以得到的啓發，非僅一端。

1887年開始創設至今依舊屹立不搖的巴斯德研究所（The Pasteur

- 
- 19 原文是：「……派思脫君（Louis Pasteur）、及馮李林君（Von Behring）、克塔思土君（Kitasto）……等，皆於防疫之事，獨標新諦，而無愧為超越前賢者……」，見：孫祖烈，〈美國種痘防疫事略〉，《東方雜誌》，10：5（上海，1913年11月1日），頁22。
- 20 吳敬恆，〈學問標準宜遷高其級度說〉，《東方雜誌》，14：2（上海，1917年2月15日），頁2。
- 21 原文是：「……自法國巴斯德氏，發明微生物後，醫學乃大改良。……然二三十年來，醫學雖有進步，但僅可謂萬分之一耳。巴斯德氏之新發明，亦僅如令吾人於昏夜之中，有天曉之希望，使吾人今日有滅害毒物之希望耳。……」，見：〈人生健康之論究〉，《東方雜誌》，14：5（上海，1917年5月15日），頁206-207；原文無署名，作者不詳。
- 22 參考：黃亦君，〈惲代英的早期思想與歷史敘述——圍繞《東方雜誌》所作的考察〉，《湖南科技學院學報》，31：5（永州，2010年5月），頁62-65。
- 23 惲代英，〈細菌致病說〉，《東方雜誌》，15：9（上海，1918年9月15日），頁174-179；原文誤署“Pasteur”為“Pastur”。

Institute / Institut Pasteur)，是巴斯德的科學業績得到法國世眾肯定的標誌。在大清帝國時代就得以知曉巴斯德的中國知識人，目光所聚，當然也朝向這座宏偉的殿堂。論壇上既出現引述介紹的文章，文教界也有踵步其跡的行動。如《東方雜誌》就嘗刊出署名「漢聲」者的文章，述其創立本末、盛況及貢獻，「已成為世界之學府矣」。<sup>24</sup>文教界裡倡言仿倣者，則以留學法國的李石曾（李煜瀛，1881-1973）為代表。李石曾是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子，行止進退，則似不畏「大逆誅族」之罪，竟加入了以推翻大清帝國為目標的革命黨隊伍。<sup>25</sup>不過，「革命不忘讀書」，李石曾從1906年開始就在巴斯德研究所進行過大豆研究，證明大豆的營養成分與牛奶相仿，還可以替代肉食。憑著他的家庭人脈關係，李石曾得到地方大員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楊士驤資助，自1908年起在巴黎開設了中國豆腐工廠，以大豆為原料製造各種食品和用品。<sup>26</sup>親歷其境的淵源，讓李石曾也興起了在中國創設同樣組織的宏願。就李石曾的認識來說，他認為，「巴斯德學院」乃是「全世界之首創」；<sup>27</sup>況且，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前，就曾有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醫科大學堂監督（相當於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屈永秋

24 漢聲，〈紀法國巴斯德醫學院〉，《東方雜誌》，15：9（上海，1918年9月15日），頁189-191；原文文末署「《時事新報》，應係錄自《時事新報》。

25 葉雋，〈李石曾的文化浪漫主義及其留法經歷〉，收入陳平原主編，《現代中國》，輯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70-88；趙穎霞，〈李石曾的政治思想及實踐活動述評〉，《保定學院學報》，22：2（保定，2009年3月），頁133-136；餘例不詳舉。

26 劉曉，〈李石曾與近代學術界留法派的形成〉，《科學文化評論》，2007：3（北京，2007年6月），頁53-56。

27 這是李石曾參與留法勤工儉學學會預備學校「開學式」的講話，見：〈留法會講演會之演說〉，《東方雜誌》，14：9（上海，1917年9月15日），頁180；李石曾所言「巴斯德學院」，即巴斯德研究所。

(1862-1953)<sup>28</sup>與法國人某君「曾有此議，且巴黎之巴斯德學院曾贈儀器若干箱」，卻因政局變易，<sup>29</sup>可未實現；及至與李石曾交好的蔡元培（1868-1940）擔任北京大學校長，<sup>30</sup>李石曾應聘任教，<sup>31</sup>遂乃舊事重提，倡議在北京設立「巴斯德學院」，由中國方面提供「地基房舍，巴黎巴斯德學院贈給儀器，更由中法兩國合集資本為之經費」。只因現實所限，力所不許，所以他提議於暫先附設於北京大學，「于雙方皆有利，用費較省，且可得專精之人才」。<sup>32</sup>李石曾的雄圖大略，當然並未實現；這番暢議，實在標誌著中國知識人不僅得以親身浸染於巴斯德的實驗室裡流傳的學術風氣，並願將之「移種栽木」，引介到中國來。在「革命團隊」裡地位更高，影響更大的孫中山（1866-1925），畢業於醫學院，對巴斯德當然絕不陌生。在他的演講裡，也不會忘記舉引巴斯德（孫中山稱之曰「柏斯多」）激勵青年世代，鼓動他們「立志」，應該以他為典範，「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sup>33</sup>正可揣想，巴斯德這位法國科學家蘊涵的意義，正為孫中山與親見其

28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頁193。

29 〈〈本校紀事〉北京大學附設巴斯德學院 Institut Pasteur 議〉，《北京大學日刊》（北京），期195，1918年8月17日，3版。

30 李石曾與蔡元培的關係，參考：劉曉，〈李石曾與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國科技史雜誌》，2008年期2（北京，2008年6月），頁144-154。

31 劉曉，〈李石曾與近代學術界留法派的形成〉，頁62。

32 〈〈本校紀事〉本校附設巴斯德學院之提議〉，《北京大學日刊》（北京），期194，1918年8月15日，2版、〈〈本校紀事〉北京大學附設巴斯德學院 Institut Pasteur 議〉，《北京大學日刊》（北京），期195，1918年8月17日，3版。

33 孫中山，〈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並合乎中國國情——在廣州嶺南大學學生歡迎會的演說〉（1923年12月21日），《國父全集》，冊2（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3），頁586。

風采的聽眾，同識共曉。

1922年，正值巴斯德百年壽慶，在中國論壇上出現了不少紀念引介文字，正為將他深植厚栽為「公民認識論」的要素，別顯新態。如《東方雜誌》即刊出周建人（1888-1984）的文章，稱譽他是「十九世紀的愛和平的，為人類服役的學者」。<sup>34</sup>那時周建人正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平素即常於《東方雜誌》發表科普文章，<sup>35</sup>這篇紀念巴斯德的文字，實非他「心血來潮」的應景之作，而是和他始終願向中國讀書界引介這些科學名家及思潮的用心，密切相關。在巴斯德百年慶壽的時代場景裡，留學法國的曾仲鳴（1896-1939），爾後因為汪兆銘（汪精衛，1883-1944）的政治關係而被視為「漢奸」乃至殉命橫死，<sup>36</sup>也是《東方雜誌》引介的「寫手」之一。曾仲鳴或是述說「微生物學為近世最新之學」，經巴斯德之發明，「始有統系，而成專科」，他的研究促成了「微生物學之進步，而極有益於農業及工業者也」；<sup>37</sup>他或是介紹巴斯德的實驗闡釋的「學理」，如何充分證明了「自然發生說」的「謬誤」，已為「世人所公認」。<sup>38</sup>《東方雜誌》諸家

34 周建人，〈巴斯德的生平及事業〉，《東方雜誌》，19：23（上海，1922年12月10日），頁32-40。

35 例如：周建人，〈達爾文以後的進化思想〉，《東方雜誌》，18：23（上海，1921年12月10日），頁40-49、周建人，〈達爾文百十三年紀念感言〉，《東方雜誌》，19：3（上海，1922年2月10日），頁5-6；又，1921年10月，經胞兄魯迅（1881-1936）等薦介，周建人到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見：謝德銓，〈周建人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頁81。

36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冊下（臺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108-111。

37 曾仲鳴，〈微生物學略史〉，《東方雜誌》，19：15（上海，1922年8月10日），頁63、頁66-67。

38 曾仲鳴，〈自然發生說〉，《東方雜誌》，19：17（上海，1922年9月10日），頁66。

作者述論巴斯德之貢獻所在，始終不絕如縷。或言經其一生的研究，「代謝作用的化學也漸重於世間了」；<sup>39</sup>或是冠以「細菌學之父」的桂冠；<sup>40</sup>或是如高維（生卒年不詳）撰述的〈社會醫學〉那樣，引申巴斯德的啓示意義與作用，他將自身參與為慶祝巴斯德百年壽慶而於巴黎召開的「國際衛生防範及道德宣傳會議」的體會，「現身說法」，介紹了各國參與這場會議而提出的報告，實在是「社會醫學」進入「第二期」的顯示，並進一步省思「社會醫學」對中國的意義，認為「衛生之學，實近今切要之工作」。<sup>41</sup>出現在《東方雜誌》上的巴斯德，做為西方（特別是法國）科學界要角之一，形影宛在。讀者執其一編，總可知悉，想必深有增廣知聞之感。那麼，《東方雜誌》在中國讀書界得以執牛耳地位，實是理有必然。

當然，如何將巴斯德建構為「公民認識論」的要素，實在有賴諸家有志之士的多方鍛鍊。即如當巴斯德百年壽慶之年，還只是南京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學生的劉咸（1901-1987），<sup>42</sup>便欲懷持普及廣傳的心願，發奮動筆。他感慨寫道，中國人「科學觀念之薄弱」，乃至連

39 健孟，〈法國近代的科學界〉，《東方雜誌》，19：6（上海，1922年3月25日），頁89；健孟應即為周建人，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全編增訂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頁815-816；不過，本文將巴斯德之名譯為「巴司丟爾」。

40 健孟，〈近代細菌學在醫學工藝上的重要〉，《東方雜誌》，20：14（上海，1923年7月25日），頁69。

41 高維，〈社會醫學〉，《東方雜誌》，22：23（上海，1925年12月10日），頁76-79；高維，具體背景不詳；高維認為，1923年為「美國社會醫學五十年紀念，在華盛頓開會討論七種問題；……此為社會醫學進步之第一期」，而巴黎召開的「國際衛生防範及道德宣傳會議」，可謂「促進社會醫學之第二期」。

42 以下關於劉咸之述說，參見：范鐵權、魏琳，〈劉咸與中國科學社〉，《科學》，65：2（上海，2013年3月），頁52-54，不一一詳註。